

商都钟鼓

贾府的茄子和蔡府的包子

唐宝民

读文学作品或读史书，经常会读到一个大家族或一个国家的败亡，因而总能让我们产生兴亡之叹，“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其实，名门望族也好，国家也好，在其败亡之前，总会有一些不为人注意的迹象，总会通过一些细节来显现出败亡的征兆，这些败亡的细节，在人们探究败亡的教训时，才会被发现，但为时已晚，只能空留叹息。

众所周知，《红楼梦》中的贾府是名门望族，但后来败落了，贾府败落的细节是什么呢？曹雪芹早在第四十一回中就给出了答案，这一回中，写到刘姥姥在贾府和贾母、凤姐等人一起吃饭，贾母让凤姐给刘姥姥夹点茄子吃，凤姐便夹了口茄子送到刘姥姥口中，说：“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得可口不可口。”刘姥姥吃了以后，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众人告诉她真的是茄子，刘姥姥便问是怎么做的，凤姐遂笑着说：“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削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王香腐

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碎丁，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爪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不禁吐了吐舌头，说：“我的佛祖，到得十来支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贾家败落的原因，当然也有多种，如元妃死去，贾家失宠；北静王失势，贾家失去靠山……但贾家平日里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以致出现经济危机，也是贾家败亡的重要原因，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对此进行了多次暗示。曹雪芹写这道茄子的用意，就是在暗示贾家日后败落的原因，这道茄子，就是贾家败亡的细节所在。

蔡京是北宋权臣，是著名的贪官、奸相，大权在握之时，也曾极尽奢靡，风光无限。但宋钦宗即位后，他就败落了，被贬岭南，途中因病，饿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蔡京败亡的迹象，从一个包子中便可以看出来，据《鹤林玉露》一书记载：蔡京败落后，有一个士大夫在京师买到了一个女子做妾，那个女子自称是原蔡太师府里做包子的厨师，于是，那个士大

夫便让她做包子给自己吃，但她却说自己不会做，那个士大夫便问她：“你既然是蔡太师府上做包子的厨师，为什么不会做包子呢？”她回答说：“我是包子厨师中专管切葱丝的，所以只会切葱丝，其余一概不会！”连做包子所用的葱丝都要有专人来切，奢侈到这种地步，不败亡天理岂能容？

《韩非子》一书中曾记载了秦穆公与由余的一段对话。秦穆公问由余：“你说，古代君主使国家兴盛和覆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由余回答说：“由于勤俭而使国家兴盛，由于奢侈而使国家覆亡。”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据此写成了《咏史》诗一首：“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珍珠始是车。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几入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舜华。”李商隐的这首诗，是兴亡之叹，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家族也好，一个国家也罢，奢靡都是败家的根本。所有败亡的细节，无不与奢靡有关，即使是在千年以后的今天，对我们依然有警示作用。

博古斋

唐宋“驻京办”

王涛

驻京办古已有之，在唐宋两代叫“进奏院”。不过在古代，一般只有省一级单位才有设立驻京机构的资格。

进奏院在唐中期出现，一般由政府设立的道（大小相当于今天的省）或节度使的藩镇派出，费用也由地方承担。由于唐中期以后地方节度使独揽军权、财权，皇帝也忌惮三分，因此其驻京办也受到重视。那时进奏院设在皇城要地，占地面积上千平方米，鼎盛时期进奏院长官竟拥有副宰相的地位。

唐朝后期，这种进奏院在长安有50多个。为获取中央的情报，进奏院获得了地方提供的充足经费，甚至承担起银行汇兑的职能。

从宋太祖开始，进奏院的官员改由中央委派，主要职能是向地方传达中央的政令。宋代进奏官员最多时有100多人，他们的主要经费是皇帝划拨的，其中最大的一块是镂刻雕版版费。这些进奏官员定期把朝廷政令刻成雕版，由驿马送到地方，然后印给地方官查看，这也是中国早期的时政类报纸。

而进奏院也成为地方官员与京官的社交场合。由于在进奏院里激烈地议论朝政，1044年，北宋著名诗人苏舜钦被北宋朝廷的官员盯上了。苏等人把进奏院日积月累的废纸出售，建立了“小金库”，用“鬻故纸公钱”召妓饮酒，受到严厉查处。

进奏院在元代被废止，但地方官员进京为各种事项活动的历史在明清两代从未结束过。

名人轶事

名人尊师

赵燕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类的训诫代代相传。我国从古至今，被传为佳话的名人尊师范例，不胜枚举。

寿镜吾先生是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启蒙老师，鲁迅一直非常尊敬他。鲁迅18岁到南京读书，每当放假回乡时，不论多忙，总要抽空去看望老师。1902年至1909年6月，鲁迅东渡日本留学8年间，经常给寿先生写信，汇报自己在异国的留学情况。1906年6月，鲁迅奉母亲之命从日本回绍兴与朱安女士结婚，虽然老在绍兴停留4天，仍从百忙之中脱身出来，专程去探望年逾花甲的寿镜吾老师。

数学家华罗庚成名之后不止一次地说：“我能取得一些成就，全靠我的老师栽培。”

1949年，华罗庚从国外回来，马上赶回故乡江苏金坛县，看望发现他数学天才的第一个“伯乐”王维吉老师。他在金坛作数学报告时，特地把王老师请到主席台上就座，进会场时让老师走在前面，就座时只肯坐在老师的首席。

以“三毛”画作闻名海内外的漫画家张乐平，曾在小学老师陆寅生的门下受过美术的启蒙。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张乐平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拎着蛋糕，去看望这位54年没有见面的小学老师。陆寅生感动地说：“我是《三毛流浪记》的忠实读者，难得你还想着我，‘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你能想着我，很不容易啊！”张乐平诚恳地说：“我的第一幅漫画是你教画的，我一直没有忘记你。”

李宗仁幼年的老师曾其新，驼背弯腰，人们戏称“曾背驼”。别看其形陋貌丑，李宗仁先生却敬若父辈。因曾年老无依，长期随军由李宗仁出钱奉养。李宗仁还在司令部驻地附近修建房屋，给老师静居。并派一名副官专门侍奉，李每天还要亲自去问安。李宗仁先生的另一名师姓的老师，也是长期随李宗仁起居。李对其照顾无微不至。老河口的老百姓都说，在李将军身上，真正体现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生之爱，感恩不忘报，实乃大丈夫。

散文

临街亦居

王文静

寄居城市，喜欢临街而居。找房源时，我喜欢选择市郊地段，楼房三四层，窗户靠近街巷的那种，前窗后阳台，都可以。

我这个宅妈，因为照顾俩小孩，不得不居家，读书写作，是主要的业余生活。累的时候，一个人伫立在窗前，隔着窗纱，眺望外面世界，是我最享受的一段黄金时间。

房子、屋子、窗子，住多长时间都是别人的。窗内，房子是别人的，家是我的。我交了房租，即可入住，怎么安排，怎么收拾，怎么放置床、家具、电视、电脑，怎么安排孩子的卧室，一切我说了算。坐着、躺着、趴着，想怎么看书就怎么看书，屋内小小的世界，我就是女主人。

窗外，是一条不大的街巷，四季转换，风雨雷电，冰雪交加，行人匆匆，车辆如流，小贩奔走，为了一根葱、一棵白菜与顾客分毫必争。烈日下，风雨里，辛苦而来忙碌而去，有时看得我，有些心酸，有些同情。至少我不怕风吹日晒，不用匆匆忙忙，我的那些文字稿酬，和教书的爱人足以应对我们眼下的生活。

春日，伫立在窗前，看不远处的郊外，杨柳发芽，桃李开花，鹅黄吐绿，红白相间，分外妖娆。假日，带上我的俩妞，在果园里嬉戏玩闹。我知道，有一个人在窗前，含笑、招手、眺望，然后举起手机，咔嚓咔嚓，一通乱照。

夏天傍晚，租屋的街对过，是这座城市，最大的汽车厂总部，站在窗前，看那些新招来的青工，在车间外的球场上，挥洒着他们青春的活力，健美的身材，跳跃的身影，篮球架下，前后奔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我的少女时代，坐在学校的操场看台上，看我的师兄学弟们激情飞扬。

双节将至，看窗外，租屋旁边那家物流公司，上班的男女老少，会有节日大礼包相赠。泰国香米、高级花生油、中秋月饼、一箱新疆马奶子葡萄，惹得我放学后的幼儿园俩丫头，一个劲儿地要求我：“妈妈，你也去物流公司上班吧，看叔叔阿姨们又发大礼物了。”我就会朝着她俩摆摆手：“NO，什么都没你俩重要！”

冬天，夜色初上，幼儿园放学早，学校放学晚，晚餐在锅里嘟嘟地冒着热气，却迟迟不见孩子的爸爸。俩孩子，眼巴巴地，守在窗前，早早地点亮灯，一遍又一遍地，朝着街巷的尽头望，等着那个熟悉的男人身影，直到听见楼下他叮叮铃铃的车铃声。孩子会三步并两步，跑下楼接爸爸，一个拎包一个拽手：“爸爸，爸爸，饭熟了，就等你吃晚饭了！”

在这座北方古城，我很喜欢它的文化气息，我只想有一座小小的房子，临街而居，写作读书。伫立在窗前，再苦的日子，过起来，有爱也有甜蜜。

新书架

《总统之死》

王佳琦

曼彻斯特作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受肯尼迪夫人的委托，通过多年的走访查证，收集到众多关键证人提供的一手资料，经过甄别后写就的这部《总统之死》，可谓研究肯尼迪之死的扛鼎之作。

本书是一部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的全景式记录，生动再现了肯尼迪去世前后六天（1963年11月20日—25日）各方面的细节。从总统在达拉斯遇刺，帕克兰医院全力抢救，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上宣誓就职，奥斯瓦尔德被杰克·鲁比枪杀，各国元首出席总统葬礼，到当时美国社会的整体氛围，两党政治理念上的分歧，相关各方在事件前后的言论，世界各地对肯尼迪遇刺的反应，甚至包括总统一家在白宫中的日常生活等都有面面俱到的叙述。书中人物众多，作为总统身边最亲密的人，肯尼迪夫人的坚强，罗伯特·肯尼迪的冷静，以奥唐纳和奥布莱恩为首的总统幕僚的忠诚——他们在关键时刻所体现出的人性闪光都得到了忠实的记录。而对于颇具争议的凶手奥斯瓦尔德和时任副总统约翰逊，作者也并没有简单地给出结论，而是结合史料对他们自身的背景和经历进行了严谨的勾勒，将他们的行为置于自身经历和大环境中进行双重考量，最大限度地发掘在他们行为之外存在于美国社会深处的更为深刻的罪恶。阅读此书，可以拨开凶案的迷雾，了解到肯尼迪遇害更深层的原因，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真实。

知味

豆腐渣、盐猴子、芝麻盐……

马浩

关于豆腐渣，家乡有个传说，朱元璋在登基坐殿时，每天吃山珍海味，腻了，回想当年落魄时，吃过的“翡翠白玉汤”，觉得味道殊佳，所谓的“翡翠白玉汤”就是豆腐渣做的。家乡人发现豆腐渣好吃，未必就是受此传说的启发，人饿了，估摸着吃什么都是美味，其实，用豆腐渣做菜肴，至少能让肠胃有东西消化。

豆腐渣，就是做豆腐时剩下的废料，多为饲料，或者肥田，把豆腐渣变成了好东西，变废为宝，也是时事使然，没办法的事。通常的吃法，放少量的油，锅红油热，加入葱花姜丝同适量的萝卜条煸炒，再倒进豆腐渣同炒，待豆腐渣炒得微黄，隐约着一股豆香，用煎饼包着，对拍粗细，双手抱着吃着，米饭都有了，吃得大气磅礴，而今想来，似乎能嗅到淡淡的豆腐渣的清香。只是很久没有吃到了，似有点怀念之思。

盐猴子，作为菜肴，绝对算是一个发明，某日，在街头吃大饼，在圆盘大锅烤的那种，盐、葱花、表面撒有白芝麻，咸香酥脆，突然想到这不就是过去当菜吃的盐猴子吗？而今摇身一变而为面点了。

所谓的盐猴子，就是面糊糊加上盐，或者添加一点葱花，用油在小菜锅里煎，因为是当菜吃的，故盐放得多些，煎得两面焦黄，切成小块，俗称盐猴子，用以卷煎饼，下稀饭，在少菜的当时，是饭桌上佳的菜肴，多在青黄不接的初春时节。待春暖花开之后，野菜开始生长了，那些大自然的馈赠品，便登上了饭桌，香椿芽、嫩槐芽、荠菜、马兰头……

这里单说嫩槐芽，嫩槐芽就是洋槐树上的叶片，刚刚发芽时，嫩嫩的，采摘下来，用开水焯一下，沥干水分，切碎了，没油的时候，便和着

大豆炒着吃，饭桌上，总算有碧色的青眼了，能勾人食欲。也可以掺和着山芋面蒸窝窝头，口感不错。

芝麻盐，作为菜肴，已是秋后的事了，秋天，芝麻收割下来，扎成小捆，在秋阳下晾晒，待芝麻晾晒咧嘴时，倒拿着芝麻捆，用木棒敲打，芝麻粒纷纷如雨，接在干净的布上，簸箕簸去杂陈的细叶碎屑，干干净净的芝麻，用水冲洗一下，便可上锅了。

芝麻粒炒得鼓鼓胀胀的，微黄，起出锅来，放进石麻里加上盐香，量少的，就放在蒜白里捣，芝麻的香气不胫而走，盈鼻不散，铺一张煎饼，撒上一溜，卷起，满口生香，而今想来，唇齿生津。

生活条件好了，大鱼大肉吃腻了，肠胃似乎又开始闹了，想起那些本不是美味的美味来了。

连载

中国生活记忆

——建国65周年民生往事



日《京华时报》) 卡式录音机带动“家庭舞会”

20世纪80年代初，录音机开始在我国兴起。马路上常见留着长发、穿着喇叭裤、拎着录音机的“新青年”，他们是当时的时尚先锋，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追星族”。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录音机进入千家万户。

1980年，在省会的公园、广场、街头等公共场所到处都能看见“露天舞会”，围观者成百上千，当时录音机刚进来，但很少有人，大家就用口琴、笛子、吉他、二胡这些方便的乐器伴奏。只要有广场的地方，不管坑洼与否，都有跳舞的人。

1980年6月14日，公安部、文化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要求“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禁止聚众跳交际舞”。《通知》认为，“这类舞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问题。有些人舞姿低级庸俗，丑态百出，伤风败俗。舞场秩序混乱，流氓打架斗殴，猥亵侮辱妇女，偷窃财物和挤死、摔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坚决要求政府予以取缔。”

封杀令出来后，办舞会的风向只有转移。随着卡式录音机的增多，家庭舞会开始兴起。街上跳舞的人少了，谁家宽敞，就到谁家去跳。邓丽君的歌和一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靡靡之音”被争相翻录。当时一代年轻人都在家

里跳，跳的是贴面舞、黑灯舞，年纪大一点的还有在街上跳的，就跳交际舞。

杨佳薇在《曾经首家舞厅经理被“请”进公安局》(载于2008年11月28日《燕赵都市报》)中记录到：1983年前后，当时石家庄市独树一帜的高档酒店燕春饭店后楼的三层，有个1000多平方米的大厅，准备办一家经营性的歌舞厅，但准备开业的那天下午，却出了意外。饭店接到公安部门传票，让饭店的总经理到公安部门接受审查，追究开办舞厅的责任，并要求不能开业。刘少泉总经理到公安部门做了解释后一直在被看守着。当时公安部门也没有处理过类似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定性，很多人在紧急地请示，被请示到的人也大都说不准。当请示到主管的市领导时，领导终于表态：有个场所大家在一起跳跳舞，活跃一下文化生活有什么大不了的，注意搞好安全措施就可以了。接到这样的答复，公安部门才放下下心来，随即放人。1983年4月8日20时，燕春饭店经营性歌舞厅的首场舞会在鼓乐声中准

时开场。客人们在翩翩起舞。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年舞厅最火的时候是什么场面，连入场都是人挤人，比坐公共汽车还挤，有时候挤到根本没处放脚步跳。人多得跟下饺子一样。那时去舞厅跳舞的客人各个年龄层次的都有，一般来说，早、中场的客人是年龄偏大的，可一到晚上，舞厅就成了年轻人的天下：交友的、谈恋爱的、图新鲜的……很多小青年去舞厅都是为了结识女孩子。在舞厅里，跳出感情成夫妻的有，跳出婚外情引起家庭动乱的也不少，所以舞厅里也经常会出现因为争舞伴的打架事件。

不过，在那个年代，舞厅在市民的生活中仍然属于高档次的娱乐活动，去舞厅跳舞也是一件特别“时尚”的事。喇叭裤、舞蹈歌曲、长头发……所有当时的流行元素，都可以在舞厅里看到。

舞姿也成了舞会管理者关心的问题，全国数万家舞厅作了这样的规定：跳舞请勿贴面、贴胸、贴身。20世纪80年代初，迪斯科开始流行于年轻人中间，势如破竹。

当天中午，炉火一直没灭，刘桂仙使用仅剩的36块钱买了4只鸭子，打算烹饪出几道菜，让邻居们尝尝。结果，消息不胫而走，嗅觉灵敏的西方媒体记者蜂拥而至。郭培基进屋时，有三个外国记者没吃上开张头餐不愿意走，郭培基向邻居借了点面条，做了几碗打卤面，几名外国记者吃得两眼放光。

美国合众社记者龙布乐后来在他的报道里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悦宾饭馆的名声还是越来越响。1981年春节，国务院总理陈慕华、姚依林到悦宾拜年，鼓励郭培基夫妇“把买卖做大”。有了“大人物”的肯定，夫妇俩高兴地买了一麻袋鞭炮，让孩子们都放了，足足响了半个钟头。

《北京第一家个体饭店店主讲述改革开放》(载于2008年11月25日《京华时报》)中记载：

陈林是悦宾饭馆的老主顾了。蒜泥肘子、锅烧鸭、五丝福、扒白菜等悦宾的几道招牌菜，一

直是陈林的最爱。在当时的北京餐馆，菜色少得可怜，不是每家都能做出这样的美味。

悦宾开张后不久，陈林从《北京晚报》的头版看到了这个消息，正在上高中的他央求父亲带他去排队尝鲜。至今他还记得，在那个下着雪的冬夜，一家三口在等了两个小时后，终于能够挤在狭窄的角落里，点了三菜一汤——锅烧鸭、鱼香肉丝、扒白菜以及鸭架豆腐汤，碗碟堆了一桌子。父亲因为高兴，还特意要了一瓶3毛9分钱的啤酒。

“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菜。”陈林回忆着自己满嘴是油的幸福表情，重复当初在悦宾饭馆里的感叹。这顿饭花费了不到4块钱，相当于当时陈林家四天的伙食费。

这顿饭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陈林在家吃饭都没胃口。在冬季的北京，桌上的主角永远是

门脸并不起眼的法式餐厅正式营业。

这家名为马克西姆(Maxim's de Paris)的餐厅是皮尔·卡丹在中国的第一笔投资，也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餐厅，中资方是北京市第二服务公司。当时北京的西餐行只有“老莫”、和平饭店、大地等几家，且均以俄餐为主。

经过9个月的装修，北京马克西姆餐厅几乎将巴黎的马克西姆复制了过来。当时任职于第二服务局的何之斌说，餐厅的壁画是法国古典风格，其中有不少不着寸缕的人体画。中资方就此上报文化局和公安局请示，结果这两家也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处理，一路上报至中央，一位副总理最终决定原样保留。

皮尔·卡丹在餐厅的开业仪式上说：“如果我能在北京开马克西姆，那我也能在月亮上开马克西姆！”餐厅从装饰、口味到服务，均是纯正的巴黎风格，只是人均200元的消费，在那个时代足以令月收入几十元的国人望而却步。(参考《北京第一家个体饭店店主讲述改革开放》，2008年11月25